

论沙龙女性在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作用

黄丽娟¹ 白林梅²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89; 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国际执法合作学院, 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将文学公共领域视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其理论更以男性为理性主体,未能揭示女性在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事实上,女性主导的沙龙不仅是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载体,更是推动文学公共领域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7世纪起源于法国的贵族沙龙、18世纪巅峰时期的沙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沙龙,女性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重审女性在沙龙文化史上的文学实践,可以丰富和完善哈贝马斯文学公共领域的性别结构与多种形态。

关键词:沙龙女性;文学公共领域;女性作家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094-10

0 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从社会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理论两方面构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论,他的研究成为后人探索公共领域的基石。“公共领域是由私人汇聚而成的公众领域……公众投身于讨论本质上属于私人、却具有公共性的商品交换与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规则。”(Habermas, 1991: 27)公共领域的主要机制包括咖啡馆、沙龙和文学社团。文学公共领域是“文学界中的公共领域”(Burger, 1991: XV),可以被定义为“依托一些具体空间,介于国家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由文学创作者、文学评论家和阅读大众组成的,依照自律和理性原则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霍盛亚, 2015: 13)。

有评论家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男权色彩,忽视女性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作

收稿日期:2025-10-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叙事研究”(BSKYZX2024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丽娟,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批评理论、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

白林梅,女,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国际执法合作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跨媒介研究。

引用格式:黄丽娟,白林梅. 论沙龙女性在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作用[J]. 外国语文, 2026(2): 94-103.

用。对此,哈贝马斯回应说“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哈贝马斯,1999:7),性别本来就是这一领域的决定因素之一,女性并非偶然从中缺席,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男性的领域。但哈贝马斯也指出,女权运动“可以加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用以表达自身的话语,以求从内部改变这些话语以及公共领域结构本身”(哈贝马斯,1999:9)。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沙龙,国内关于沙龙的研究多关注其对女性的教育和思想启蒙作用。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起点,深入分析17世纪到20世纪西方女性在沙龙这一文学公共领域的生成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旨在弥补文学史上沙龙女性作家的缺失,使沙龙女性对文学公共领域的贡献浮出地表。

1 早期的贵族沙龙:女性与文学公共领域的萌芽

哈贝马斯认为理性讨论是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之一,早期贵族沙龙中的交谈因为注重礼仪和社交而不可视为理性讨论(Habermas,1991:31)。但沙龙交谈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创作并非都服务于歌颂赞助人这类社交目的,沙龙女主人的文学创作展现出那个时期贵族女性的独特才华。可以说,沙龙为受到公共领域歧视和排挤的女性提供了参与文学领域和政治讨论的空间。历史上第一个沙龙由贵族女性朗布依埃侯爵夫人(Madame de Rambouillet)创办,位于巴黎卢浮宫附近,起名为“蓝色沙龙”(chambre bleue)。沙龙的建筑设计精心别致,由红砖、石板和白色的琢石建成,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古典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客人从一个侧门进入,路过一系列精心布置的房间后才到达“蓝色沙龙”。沙龙中聚集了贵族、文人、资产阶级等来自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他们不以等级和出身而是以才学、智识和礼仪进行交往。

朗布依埃夫人被学者认为是沙龙的缔造者,她的沙龙被视为后世沙龙的榜样和原型。在物质层面,她缔造了一个客人们舒适交往的空间;在社交层面,她确立了知识分子、社交名媛和艺术精英自由交谈的风俗机制(Anderson al.,1988:104)。朗布依埃夫人的沙龙取代了用于举办宫廷庆典和豢养艺术家的宫廷宴会,体现出贵族社交天地中的现代特征(Habermas,1991:31)。蓝色沙龙所具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该沙龙聚集了探讨文学等话题的作家和读者,为不同代际的作家提供交流机会,“年轻作家从中得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精练自身才华,而资深作家则可施展影响、维系声望”(达尔科,2019:164)。其次,该沙龙向平民开放,其中的贵族与文人平等相处,贵族与资产阶级、王公贵族的子弟与小商小贩的子弟相互往来(Habermas,1991:33)。朗布依埃夫人将沙龙上升到一种明确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她的沙龙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

沙龙为女性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她们依托沙龙活动创作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首先,

沙龙是矫饰文学(*preciosity*)^①的诞生地。这种文学风格起源于17世纪沙龙女性的对话和文字游戏,其代表作家是玛德莱娜·德·斯屈代里(*Madeleine de Scudery*),她将矫饰主义与英雄主义结合,创作了法国最重要的三部英雄传奇——《易卜拉欣,或杰出的巴夏》(*Ibrahim, ou l'illustre Bassa*)、《居鲁士大帝》(*Le Grand Cyrus*)和《克莱莉》(*Clelie*)。矫饰主义表达对于远离当下现实世界的渴望,当时的人们不喜“小市民”的品行和平淡的情节,追求天马行空的想象,于是“英雄主义”得以发展。这类作品聚焦战争、荣誉和爱情,充满各种荒诞、轰动和意料之外的情节(达尔科,2019:168)。《居鲁士大帝》描写英雄居鲁士(*Cyrus*)征服亚洲并与恋人玛达娜(*Mandana*)完婚的故事。不过,这些传奇故事往往以现实中的沙龙为蓝本,例如《居鲁士大帝》表面描写一个东方行宫,实际上反映了法国17世纪的贵族生活,对朗布依埃夫人的蓝色沙龙做了细致描绘(*Mason*,1891:37)。这些传奇于17世纪50年代被译入英语世界(*Salzman*,2002:306),在英法两国都颇受欢迎。

其次,矫饰文学重视人物刻画,成为文字肖像(*portrait*)的源头之一。沙龙中的肖像猜谜游戏衍生出矫饰文学中为特定人物创作的文学肖像,后发展成一种文学体裁——文字肖像,即像绘画一样再现某人的外貌和性格特征。斯屈代里的传奇故事便是文字肖像的滥觞(*Mason*,1891:56),她之后的大郡主(*La Grande Mademoiselle*)在沙龙中推广自己为当时名流创作的文字肖像,这些作品广受欢迎并被收集出版为《肖像集》(*Divers Portraits*)。一时间文人、贵族和资产阶级纷纷效仿,其中最优秀的是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的《品格论》(*Les Caracteres*,1688)(*Mason*,1891:56)。此书博采众散文家之长,结合源自17世纪沙龙的文字肖像,希望改变当时宫廷中虚伪和腐败盛行的现状,在法国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被莫里哀(*Molière*)批评为矫揉造作,但矫饰文学自有其价值,并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一方面,矫饰文学崇尚优秀的思想,鼓励创新,从而实现贵族阶级所追求的超越他人的理想(达尔科,2019:165);另一方面,沙龙中的文字肖像游戏具备了部分现代性特征。文字肖像描写特定的人物,削弱了专制时期赞扬和歌颂皇家人物这一核心表现原则。文字肖像的价值来自其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为只有发起者能够欣赏关于特定对象的模仿技巧,或者从模仿技巧中猜到被模仿对象”(*Harth*,1983:105),而描写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Watt*,1957:15)正是现代小说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创作文字肖像的女性是现代主义的(*Landes*,1988:30)。这一体裁在20世纪巴黎左岸花园街(*rue de Fleurus*)27号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沙龙中再现,斯泰因结合立体主义(*Cubism*)技巧创作了大量极具先锋性的现代主义文字肖像。

再次,沙龙孕育了另一种文学类型——童话(*fairy tale*),这一术语最早由沙龙女主人

① 矫饰文学追求精致的品味、风格和语言等,有时显得矫揉造作。这种风格盛行于17世纪的法国沙龙。

多尔诺瓦夫人(Madame d'Aulnoy)提出。她主持自己的沙龙,也频繁光顾其他沙龙,尝试将沙龙的文学风格用于讲述民间故事母题,“创造出朗诵给整个群体共享的童话”(Stedman, 2013:130)。这里的童话与格林兄弟童话不同的是在内容上常影射贵族生活,形式受到对话风格的影响,将童话植入小说的叙述框架。多尔诺瓦夫人的处女作《希波吕托斯,道格拉斯伯爵》(*Hypolitus, Earl of Douglas*, 1690)将《快乐岛》(“The Island of Happiness”)的童话内置于希波吕托斯在修道院讲述的故事中(Stedman, 2013:131-132)。《快乐岛》中王子的旅途则是17世纪法国不同类型的绘画、音乐和文学沙龙的缩影。

早期贵族沙龙是文学公共领域的萌芽,为女性提供了进入文学公共领域的平台。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公共领域由男性主导,女性被局限于私人领域。沙龙的出现有助于改变女性的地位,为女性介入公共领域提供了途径。17世纪的沙龙女性体现出一定的现代女性思想。她们的一个特点是“存在于婚姻体制之外”(Landes, 1988:30)——有人早年丧夫,有人终身未嫁。例如斯屈代里一直单身,她对女性的评价体现出思想的先锋性:她既反对终日卖弄风情的轻浮女性,也不喜欢一心操持家务的女性,亦否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尽管她主张女性读书学习,却不喜欢卖弄学识的女学究(Mason, 1891:38)。她终身未嫁,因为“她害怕失去自由”(Mason, 1891:45)。沙龙出现的意义在于女性能够在首都巴黎创造一个她们主导的空间、世界和生活(Anderson al., 1988:106)。沙龙连接起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成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为自己发声并争取获得主体性的途径。

2 巅峰时期的沙龙:女性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

18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众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印刷业持续繁荣,阅读公众开始出现,这些因素促进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建构。越来越多的民众拥有了闲暇时间,产生了学习和阅读的需求。他们在语法学校、英文学校和慈善学校等机构识字,在咖啡馆等公共领域大声朗读,将文字内容传达给不识字的听众。同时印刷业持续发展,报纸杂志和新闻报纸的数量快速增加。1710年颁布的第一部现代意义的版权法《安妮法令》(*The Statute of Anne*)保护作者的利益,推动图书市场进一步繁荣。在此背景下,书商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出现,他们不仅组织出版,还搭建图书销售网络,“借助图书馆的创建、期刊连载、印发书目等方式培养民众阅读习惯,培育阅读市场”(胡振明, 2018:216)。以上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具有批判能力的、阅读的公众,他们在咖啡馆和沙龙等空间聚集交谈,由此诞生了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

沙龙女性对文学公共领域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她们对书信体小说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沙龙女主持人都留下大量书信作品,其中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信件与伏尔泰的书信都是18世纪被广泛阅读和模仿的对象,对狄德罗、卢梭等作家(Landes, 1988:63)和后

世书信体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英语书信体小说的开先河之作是1683年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的《一位贵族与其妻妹的情书》(*Love 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s*)(张昕,2019:146),贝恩与其他几位较早的女性作家被认为是“小说之母”(Spender, 1986:52),在巧妙地整合书信材料方面,她是理查逊之前最优秀的作家(Day, 1966:161-162)。到18世纪,书信体小说进入黄金时期,出现了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帕米拉》(*Pamela*, 1740)等代表性作品。写信和阅读培养了公众的主体性,丰富了公众的情感体验,毕竟人的世界是情感的世界,文学作品作为现实生活的投射,反映了人类情感(宁一中,2025:4),公众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文学中情感丰富的虚构世界,又根据虚构经验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更好。具备主体性的私人在完成阅读之后,进入沙龙和咖啡馆等公共领域,与他人就所读文学作品展开讨论,形成了具有批判性的公众,他们通过报纸、杂志及报纸的职业批评等媒介联系在一起,形成提倡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Habermas, 1991:50-51)。

其次,沙龙女性以作者身份进入文学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德·埃皮奈夫人(Madame d'Epinay)的沙龙女主人身份,却忽略了她的作者身份——她曾为《文学信札》(*Literary Correspondence*)撰稿(Habermas, 1991:41)。像德·埃皮奈夫人一样,18世纪英国“蓝袜”沙龙(Blue Stockings Society)^①的女主人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也以作者身份进入文学公共领域,出版了《论莎士比亚的创作与天才》(*An Essay on the Writings and Genius of Shakespeare*, 1769)以回应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此书虽匿名出版,却备受欢迎,被译入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在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Eger, 2010:145)。

沙龙女性创作了小说、诗歌、游记和文学批评等不同类型的作品。意大利贵族吉乌斯蒂娜·雷尼耶·米歇尔(Giustina Renier Michiel)于18世纪末开始在威尼斯主持沙龙,其宾客包括著名意大利文学家乌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和法国的斯塔尔夫夫人(Madame de Staël)等名流。在沙龙宾客的帮助下,米歇尔精心调研并撰写了六卷本的《威尼斯节日的起源》(*Le origine delle feste veneziane*, 1817)(Dalton, 2003:76),该书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威尼斯的神话和公共仪式。同时期英国伦敦蓝袜沙龙中的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首次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作品译入英语,发表了《爱比克泰德现存作品全集》(*All the Works of Epictetus, Which are Now Extant*),这一译作于2018年被富兰克林经典贸易出版社(Franklin Classics Trade Press)再版。此外,卡特创作的诗集在她生

① 根据当时的风俗,人们穿黑袜子出席正式场合,在非正式场合则穿蓝袜子。历史上,拉丁文翻译家本杰明·斯蒂林福利特(Benjamin Stillingfleet, 1702—1771)受到沙龙女主人邀请参加文学聚会时,因许久以来疏于社交,没有合适的礼服,于是便穿了一双家常的蓝袜子出席。一些保守人士对他的穿着颇有不满,便戏称他参加的是“蓝袜”沙龙。此后“蓝袜”常被用来称呼“女学者”。

前就再版了四次,其中有诗作被收入约翰逊博士的期刊《漫步者》(*The Rambler*) (Tinker, 1915:174)。蓝袜沙龙的另一成员夏洛特·伦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则创作了与《堂吉珂德》相对应的《女吉珂德》(*The Female Quixote*, 1752),作品由女性贞洁与婚姻问题折射小说兴起背后资产阶级的崛起。在与伦敦隔海相望的爱尔兰,旅行者、女作家凯瑟琳·薇尔莫特(Katherine Wilmot)曾参加法国的沙龙,将她在欧洲大陆的旅行见闻记录在游记中(Wolf, 2019:622)。不过她的许多作品直到20世纪才出版,例如1992年面世的《凯瑟琳·薇尔莫特的欧洲大陆之旅》(*The Grand Tours of Katherine Wilmot*)。

再次,沙龙女性还以赞助者的身份介入文学市场,向文坛领袖和书商举荐新作家,参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英国蓝袜沙龙中的汉娜·莫尔(Hannan More)偶然发现送奶工安妮·伊尔斯利(Anne Yearsley)在闲暇时间写诗,便与蒙塔古一道为她提供经济、创作和出版支持,让她在伦敦社交界和文学圈广为人知。1785年,伊尔斯利的《诗集》(*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Tinker, 1915:205-207),她被称为“送奶女诗人”(milk woman poet)。其后伊尔斯利与莫尔因财务问题失和,事业发展因此受挫。将送奶工打造成畅销诗集作者充分说明蒙塔古的蓝袜沙龙在当时的文学公共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赞助蓝袜沙龙内部成员,蒙塔古还将诗人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介绍给文坛领袖和书商,并把他引荐给国王,诗人因此获得两百英镑年金和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Tinker, 1915:192)。

沙龙女主人的慷慨相助让初出茅庐的作家受益匪浅,就连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这样著名的小说家在成名前也曾受过“莫伊拉之屋”沙龙(Moira House salon)中女性的帮助。该沙龙的女主人——爱尔兰贵族莫伊拉伯爵夫人(Countess of Moira)在都柏林举办沙龙,她提倡表现某一特定区域风土人情的地方小说(regional novel),其沙龙宾客包括被誉为地方小说创立者的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和司各特等。“玛利亚·埃奇沃思的小说是伟大的苏格兰诗人、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灵感来源,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有据可查的,但鲜为人知的是司各特在1805年以著名诗人的身份进入文学圈之前,也曾向莫伊拉女士寻求帮助。”(Prendergast, 2015:121, 124)蒙塔古和莫伊拉都依托自己的地位、财富和声誉赞助新作家,进而对文学公共领域产生影响。

同时期的法国沙龙女性则通过帮助男性完成大百科全书,间接地参与文学公共领域。一方面,乔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的沙龙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d'Alembert)联系《百科全书》的作者提供了便利。达朗贝尔在这里邀请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布封(Comte de Buffon)参与编撰,让“《百科全书》的计划取得初步进展”(比利,1992:67)。另一方面,《百科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多次遭到法国当局查禁,狄德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情形之下,乔弗林夫人邀请学者们到自己的沙龙中开展编撰工作,为这一工程暗中提供经济和

社会上的帮助。“可以说,18世纪法国沙龙女主人们的思想已经闪耀着女权主义的光芒。”(宋炀,2021:12)

18世纪沙龙女性改变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态,沙龙女性不仅留下大量书信集,影响了18世纪流行的书信体小说,而且以出版作品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还赞助其他作家进入文学场,增强女性在文学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和地位。蓝袜沙龙中的女性通过文学事业获得经济独立,女主人蒙塔古成长为当时文学公共领域中堪与约翰逊媲美的人物。

3 现代主义的沙龙:女性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

哈贝马斯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1990年版序言》中坦承:“我有关从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这一发展线索的论断过于简略。当时我过分消极地判断了大众的抵制能力和批判潜能。”(哈贝马斯,1999:17)实际上大众传媒时代的公众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理性反思和批判能力。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形成市场,对文化产品产生间接影响。文学公共领域并未瓦解,以沙龙为代表的文学公共领域一直存在。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机制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衰落,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许多国家出现短暂的复兴。现代主义时期,沙龙女性以崭新的方式参与并影响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

首先,沙龙女性依托沙龙,与编辑、评论家和出版商合作,利用杂志评论增加作品的热度和销量,实现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有限生产场到大生产场的突破,从而在文学公共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公共领域体现出新的特点。随着交往人群不断扩大,面对面的交流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例如由一千人组成的文学公共团体需要借助报纸这样的媒介才能把信息传达给所有人,所以“到了20世纪,传播媒介是‘公共领域’不可或缺的因素”(董洪川等,2011:164),公共领域的交往机制从咖啡馆、沙龙和聚会等形式扩展到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等媒介,这些媒介被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等现代作家用来推广自己的作品。乔治·艾略特在英国伦敦北岸21号名为普里奥里(Priory at 21 North Bank)的家中举办星期日沙龙,其宾客包括查尔斯·狄更斯、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该沙龙是连接作者、读者和评论者的纽带。在创作《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的过程中,艾略特夫妇邀请《学院》(*Academy*)杂志的书评作家伊迪丝·西姆科克斯(Edith Simcox)参加星期日沙龙,“她此次拜访之后不到三周,《学院》就出版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书评”(McCormack, 2013:76)。类似的书评吸引了更多读者购买和阅读《米德尔马契》,增加了作者的文学声誉。

其次,沙龙女性还通过创立出版社或创办期刊的方式介入文学市场。英国作家弗吉尼

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主持沙龙,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和罗杰·弗莱(Roger Fry)等社会精英每周四到布鲁姆斯伯里聚会交谈。在沙龙的启发和影响下,伍尔夫等作家“采用新的实验手法展示现代人的困境,被奉为经典文学现代主义”(黄丽娟,2022:41)。现代主义作品因其先锋性面临出版困境,伍尔夫便与丈夫共同创立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了许多现代主义作品。这些优秀的作家建立了霍加斯出版社的良好信誉,而出版社的名声反过来又增加了作者的文名。伍尔夫通过筛选并出版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赋予霍加斯出版社“独立和先锋的名声”(Wilson,2012:238),推动了以她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为代表的先锋现代主义文学生产。

再次,沙龙女性依托国际化的现代主义沙龙提携年轻作家,促进跨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位于巴黎左岸雅各布街(Rue Jacob)20号的娜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的沙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包括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庞德、艾略特、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等。这不同于哈贝马斯的时代——彼时文学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为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而20世纪沙龙宾客的构成体现出国际化特征。这些现代作家致力于文学创新,但他们的作品因为重视形式创新、大量用典、采用意识流等先锋实验手法,具有晦涩难懂的特征,主要在作家团体、大学师生中流通,局限于布尔迪厄所说的有限生产场。因此,他们主要追求经典作家或学术院和沙龙等机构(Bourdieu,1996:292)的认可。于是,巴尼的沙龙在现代主义作家寻求认可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尼通过沙龙专场宣传和推广斯泰因和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等人,助力她们成为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而斯泰因成名后又在她的沙龙中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安德森等年轻一辈的作家引入文学公共领域,与他们共同推进文学现代主义的发展。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生产作品的艺术家本身是在生产场中被造就的,他被艺术家、作序者和书商等人发现,被封为“著名的”(consecrated)、被认可的艺术品(Bourdieu,1996:167)。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虽然女性通常处于被统治地位,但是像巴尼和斯泰因这样的沙龙女主人因为拥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广泛的人脉,有能力将一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男性艺术家推向文学公共领域的重要地位。

4 结语

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理论未能充分挖掘沙龙女性对文学公共领域的贡献,体现出男权特征。沙龙女性从17世纪开始介入文学领域,她们的沙龙对话与活动所激发出的文学作品成为矫饰文学、文字肖像和童话等文学类型的源头。沙龙女性的书信出版后对书信

体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8 世纪的书信体小说作为阅读媒介,培养了大众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成为文学公共领域中讨论的基础。这一时期沙龙女性不仅以间接的方式促成《百科全书》的完成,而且创作了小说、诗歌、游记和文学批评等不同类型的作品,以作者身份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并以赞助人的身份协助更多作家进入文学公共领域。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后衰落,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短暂的繁荣。此时沙龙女性借助期刊杂志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创立出版社推广先锋现代主义,以崭新的方式介入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沙龙女性体现出现代女性主义思想,改变了文学公共领域的结构和样态,丰富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性别维度,赋予了文学公共领域国际性特征。

参考文献:

- Anderson, Bonnie S. and Judith P. Zinsser. 1988. *A History of Their Own: Women in Europ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M]. Vol. 2. New York: Harper & Row.
- Bourdieu, Pierre.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M].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ger, Thomas. 1991. Translator's Not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alton, Susan. 2003. *Engender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Reconnecting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M].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Day, Robert Adams. 1966. *Told in Letters: Epistolary Fiction before Richardson*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ger, Elizabeth. 2010. *Bluestockings: Women of Reason from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bermas, Jürgen.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arth, Erica. 1983.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ndes, Joan B. 1988.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son, Amelia Gere. 1891. *The Women of the French Salons* [M]. New York: The Century.
- McCormack, Kathleen. 2013. *George Eliot in Society: Travels Abroad and Sundays at the Priory*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rendergast, Amy. 2015. *Literary Salons Across Britain and Ireland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alzman, Paul. 2002. Prose Fiction [G]// Anita Pacheco. *A Companion to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Sponder, Dale. 1986. *Mothers of the Novel* [M]. London: Pandora.
- Stedman, Allison. 2013. *Rococo Fiction in France, 1600–1715: Seditious Frivolity* [M].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 Tinker, Chauncey Brewster. 1915. *The Salon and English Letters: Chapters on the Interrel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hnson*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Watt, Ian. 1957. *The Rise of the Novel*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son, Nicola. 2012. Virginia Woolf, Hugh Walpole,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Book Society[J]. *ELH*(1): 237-260.
- Wolf, Alexis. 2019. The “Original” Journals of Katherine Wilmot: Women’s Travel Writing in the Salon of Helen Maria Williams [J]. *European Romantic Review*(5-6): 615-637.
- 比利. 1992. 狄德罗传[M]. 张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达尔科. 2019. 法国文学史[M]. 张兆龙,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董洪川, 王庆. 2011. “公共领域”与 20 世纪英美诗歌的“根本性转移”——关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发生的另一种阐释[J]. *外国文学研究*(5): 158-166.
- 哈贝马斯. 1999. 1990 年版序言.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胡振明. 2018. 作品、市场、社会: 文学公共领域形成初探[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 211-221.
- 黄丽娟. 2022. 毛姆《彩色的面纱》的跨国现代主义解读[J]. *外国语文*(4): 40-47.
- 霍盛亚. 2015. 英国文学家对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作用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宁一中. 2025. 叙事学: 从经典/后经典走向 AI 时代[J]. *外国语文*(5): 1-12.
- 宋炆. 2021. 女性共和国 文人乌托邦: 图像所见 18 世纪法国沙龙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启蒙[J]. *艺术设计研究*(5): 5-13.
- 张昕. 2019. 论贝恩小说《一位贵族与其妻妹的情书》的政治隐喻[J]. *外国文学*(4): 145-154.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Salons in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HUANG Lijuan BAI Linmei

Abstract: Jürgen Habermas considers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as the precursor to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However, his theory centers on men as the rational subjects and fails to explain women’s contributions in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fact, salons hosted by women are not only an institutional space of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but also a crucial mechanism sustaining its operation. From the aristocratic salons that emerged in 17th-century France to the flourishing salon culture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modernist salons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omen have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By re-examining women’s literary practices within the history of salon culture, we can enrich and refine Habermas’ theory of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ts gender structure and heterogeneous forms.

Key words: women in salons; literary public sphere; women writer

责任编辑: 冯革